

广东万里碧道背景下地域文脉保护和利用的营建途径——以花地河碧道为例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Contex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uangdong Ecological Belt: A Case Study of Fa-ti River Ecological Belt

包宇珩

BAO Yuheng

摘要

荔湾自古水道通达, 经贸繁荣, 基于流域空间发展取得的出色成就使其成为明清时期人文荟萃的城市中心。探究河流主导下“水脉”与“文脉”互动的历史机制及演进逻辑, 可为碧道建设中地域文化景观的承续和更新提供理论参考。以花地河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 结合竹枝词、诗文, 回溯历代人文活动沿水系分布的生成情境和乡土意象。结果表明, 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成就了文脉延续的特征, 河流作为孕育文化的空间形态, 也成为文脉延续的重要载体。自宋代繁荣的“大通港”到清代崛起的“十三行”, 花地河历经持续的叠加伴生出港口贸易、花木生产、园林艺术、滨水游乐 4 个历史文化特征。最后据此归纳出花地河碧道地域文脉保护和利用的 4 种营建途径: 构建良性水循环、重现滨水风貌、集纳岸线空间、建立情感认同。

Abstract

Liwan District has always had access to waterways and prosperous commerce since ancient times.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shed space have made it a city center with gathering of talen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mechanism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 vein' and 'regional context' under the dominance of river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renewal of region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Belt. Taking the Fa-ti River as an exampl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combined with the Zhuzhici and poetry, to trace the generation context and local imagery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long the water system throughout hist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culture resides contribut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Rivers as a spatial form that nurtures culture, have also become important carrier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Since the prosperous 'Datong Port' in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rising abruptly 'Thirteen-trades monopol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a-ti River has undergone continuous stacking and has produced fou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ort trade, flower production, garden art, and waterfront amusement. Based on this, four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for preserving and utiliz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the Ecological Belt are summarized: establishing a virtuous water cycle, recreating the riverside landscape, integrating the riverside space, and fosteri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文章亮点

1) 以水带城, “水脉”与“文脉”的持续演进支撑了人地关系的有机进化; 2) 自然与人文荟萃的花地河是地域文脉长足发展的见证; 3) 基于历史与现实互映, 探讨碧道景观滨水乡土特征保护和利用的营建途径。

关键词

岭南园林; 万里碧道; 地域文化景观; 生态景观; 花地河

Keywords

Lingnan Garden; Ecological Belt; Reg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Ecological landscape; Fa-ti River

收稿日期: 2024-05-30

修回日期: 2024-08-27

2020年8月《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年)》批复实施,提出将覆盖全省建立以水为纽带,以江河湖库及河口岸边带为载体,统筹生态、安全、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的复合型廊道——万里碧道。目前,碧道建设已初见成效,现阶段多项研究聚焦于水文、生态两个视角,关注河道工程规划^[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2-3]、廊道与生态网络构建^[4-5]等碧道实践,而对碧道水域本体的文化价值及其地域特征提及较少。以自然地理为依托,河流对城市的作用除提供生产资源、生态系统外,也塑造了独特的滨水风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居环境的构建,进而形成兼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化景观。

近年来,在坚定文化自信、践行生态文明的理念推动下,国家于城乡建设层面对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与利用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州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时强调,城市文明的传承与根脉延续十分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西关是以前广州城西的关厢之地,现属于荔湾区。因其水域广阔,河湖密集,自古至今均是生态优美、经济富庶的宜居之地。辖区最大的内河——花地河,是荔湾人民的“母亲河”,为珠江航道的一条支流,全长约8.1 km,宽约100 m,从石围塘附近的白鹅潭起,经花地、茶滘、东濠等地自北向南贯穿整个芳村。历史上,花地河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渥的区位条件,对荔湾乃至珠江水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花地河碧道是荔湾区首期打造的碧道示范工程,也是荔湾区高标准建设的三大碧道之一^①。花地河碧道从水安全、水生态着手,充分挖掘河流文化价值,高度融合周边功能与滨水用地布局,构建出具有荔湾特色的碧道景观与游憩系统典范。

综上,本文以花地河碧道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结合竹枝词、诗文,侧重以人文底蕴为视角探讨碧道景观空间特征与地域文脉保护和利用的营建途径,以期在现代城乡规划中滨水景观的地方性特质营造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1 广州城的水韵风貌

1.1 因水为商

广州城筑于“云山珠水”之间,因水而生、依水而兴。“云山”指白云山及其依托的山系,“珠水”除珠江外,还包括南部密集的河涌、湖泊、潮汐水道等。纵横交织的水网连接山林桑田,形成了岭南特色的景观格局。宋代广州疏浚开凿“六脉渠”,水渠顺南北走势贯穿内城,如同人体的筋脉。渠水出城汇入东、西、南濠后通达于珠江,可使广州城中无水患^②。同时,六脉水网的构造使得商船能够直接进入羊城,

助推了商业的繁荣。“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山水相兼的基本架势,孕育着广府文化,维系着广州城两千多年的长盛不衰^[6]。

有赖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区位优势,广州在唐宋时期已跃居为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彼时以广州为起点的“通海夷道”,即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亦是东西方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重要载体^③。至清代广州“一口通商”^④时期,空前的全球性贸易循环促成了广府地区的多元文化形态,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开放灵活的独特气质。同时,贸易带来的巨额税收使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⑤。从多种意义上来说,水脉作为广州地域性和时代性的源流推动城市发展达到了巅峰。

1.2 以水为乐

河流作为商贸通道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孕育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滨水风土景观。历史上的广州水道十分繁华,以水路交通为支撑的人文活动发展空前高涨,且历代羊城八景中“荔湾渔唱”“菊湖云影”“海山晓霁”“珠江静澜”等大都与“水”有关。清代,广州成为岭南园林荟萃之地。水系分布不仅对园林择址、立意有重要影响,也关乎着游赏方式。得益于水上交通之便,于广州城内沿河涌之水乘舟可漫游城郊苑,且均能在一日内往返。游园活动的兴盛,使围绕水路展开文化活动成为广州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情境。市民在湿热的天气里乘船,于水上饮食、游艺,观赏粤剧,倍感清凉风趣。滨水风土景观也呈现出岭南乡土景观中最鲜明的地域特色,清代诗人张维屏(1780—1859)有诗云“千树离支(荔枝)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可见旧广州城的水乡景色不亚于姑苏。

1.3 水文化景观亟待复兴

现今,传统水乡景色受到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的多方面冲击,不合理的空间规划割裂了水文的自然过程,导致河网退化、水质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产生,广州水韵风光逐渐消弭。城市化进程下的景观建设对于实用功能的过度追求,又进一步导致地方特质被破坏甚至文化丧失,几十年间因水而生的城市风貌失去了其所依托的环境,水道纵横的城市特征也消失殆尽。

近年来,广州围绕历史水系、传统街区等开展了一系列城市肌理修复、更新等行动,河湖重现了清漪的景致。而随着人文底蕴被挖掘,大量水上文化与滨水活动回归。由此可见,历史性城市景观不能被孤立当代生活语境之外,它的更新与发展既需突显纪念意义和文化价值,又肩负着构建现代城市生态系统、承载传统习俗的社会责任^[7]。因此,在“万里碧道”背景下,为使沉寂的滨水空间更好地契合当代的宜居需求,重构“水脉”时空图景,首先应确认文脉的历史价

① 出自广东省水利厅 <http://slt.gd.gov.cn>。

② 出自清代仇巨川《羊城古钞》中的“古渠有六,贯串内城,可通舟楫。使渠通于濠,濠通于江海,城中可无水患,实会垣之水利。”

③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终点缚达城即今巴格达。出自北宋欧阳修、宋祁等合撰的《新唐书·地理志》。

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全国设立四大海关:粤海关(广州)、闽海关(厦门)、浙海关(宁波)和江海关(上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

⑤ “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出自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

值，并在地方特质认知的基础上考虑文脉的承续及保护利用途径，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

2 花地河地域文脉的源流与发展

2.1 河流与港口贸易

南汉乾亨元年（917年）刘龚建国称帝，定都兴王府（今广州），翌年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南汉佛教兴旺，皇室对应二十八宿之数，在府城四方各建七座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其中“南七寺”为：宝光、千秋、古胜、延祥、地藏（另两寺名不可考）^[8]。据《南汉书》记载宝光寺所处为“河之南岸”，即珠江南岸芳村大通滘。大通滘处于广州连接西江和北江交通枢纽的要道，北上船只经过此处可通往珠江三角洲各县镇，故曰“大通”^[9-10]。“滘”是“激”的俗写，在广东主要用作地名，其义是分支的河道，亦可用作河流名^[11]。前往宝光寺参佛的学者众多，以至于寺舍不能尽数容下，因此学者多在田间结庐而居。信众献花礼佛，带动了当地的花卉产业的兴起^[12]。至宋代大通滘建立大通港，其畅达开阔的航线使因水得名的“大通镇”经济愈发繁荣，之后大通镇与南海郡番禺县中的猎德、瑞石、平石、大水、石门、白田、扶胥并称“宋代八大镇”^[13]。宋代政和六年（1116年），广州经略使陈觉民奏请朝廷改寺名为“大通慈应禅院”，大通寺因而得名。清代《番禺县志》记载：“烟雨井在大通寺中，晨熏初散，常袅轻烟，所谓大通烟雨是也”。寺内的“烟雨井”是宋、元羊城八景“大通烟雨”之胜地。

2.2 河流与花木生产

2.2.1 花埭（花地）

大通滘所在地芳村^①，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因水网密布，河溪纵横，花卉贸易进一步扩大，以生产供佛用的素馨花 *Jasminum grandiflorum*、茉莉花 *Jasminum sambac* 著称。但大通滘地势低平，花农需筑土坝截水方可种花，故以大通滘为核心辐射周围村田的区域称为“花埭”。“埭”有“以土塌水，壅土为堰”之意。不同于普通话发音中“埭”和“地”的明显区别，粤语“埭”与“地”的发音相近，在此后流传中“花埭”逐渐音变为“花地”，宋代大通滘至清代也改称为花地河^[14]。口语词入地名展现出鲜明的广府特征，“花”“地”“河”3种自然元素，也见证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风貌民情。

明清时期花地花木栽培及耕作更具规模，得近城和水运之便，与广州城仅鹅潭之隔的花地河承担了灌溉和运输的功能。于光绪元年（1875年）集结成书的《羊城竹枝词》，对花地花木生产及贸易之壮观有全面的描写，以花埭、鹅潭描述限定的耕作区域，如“花埭人归趁夕曛，香风一路卷罗裙”（刘昌期），“外有鹅潭滚滚连，珠江红浪映花田”（钱应元）；以花田、花洲描述花卉生产规模，如“世界花花认不真，花田种花花成茵”（黎秉枢），“玉貌花洲拥花桡，卖花刚又值花朝”（黄绍勤）；还有描述以船载花的独特贩

卖形式——利用水路便捷平稳地运输轻巧易损的花卉商品，如“花依花叟各奔波，齐集花墟待过河”（胡鹤），“瓜皮轻荡越江波，满载花香晓渡河”（江仲瑜）^[15]。以状摹人文风物见长的竹枝词，蕴涵着大量的地理文化信息，可见当时花地依托花地河水系的花木生产和贸易已形成一定规模。

2.2.2 八大名园

便捷的水路交通及沿岸风光不仅为花木展销提供了契机，还为园林营造提供了有利条件。花地经营者有意识地将花木结合园林空间展示，使花地河畔涌现出一批兼具经营性和观赏性的花圃园。花圃园数量多达30余座，星罗棋布，其中当以“八大名园”广为传颂。以昔日羊城八景的“大通烟雨”（花地河口东岸）为起点，醉观园、留芳园、群芳园、纫香园、新长春园、合记园、翠林园和余香圃坐落在花地河畔及其支流一带，花木葱茏、风光旖旎，是岭南园林发展史上的风华片段^[16]。各名园在重要节庆、神诞日特设花局“斗花”，炫奇争胜，招引大量宾客。晚清诗人梁修（1859—1899）应邀于纫香园花局所著的《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吟咏花地中外名花100种，将品艳评香融合于节日气氛之中，营造出一场情思与审美的深度对话。

竹枝词“黄木湾头粉蝶飞，白鹅潭张锦鲤肥。今朝正好游花埭，玫瑰花开夹紫薇（李环浦）”中描述花地不单是万滘曲折的花卉之乡，更是烟水十里的游览胜地。河苑绮错的花地景观由于良好的管理和明媚的风光，具备游览观赏的可能，并成为“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向西方人开放的政策前提^[17]。

2.3 河流与园林艺术

2.3.1 行商庭园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于广州设立粤海关，“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舵（舵），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18]。”清政府实行“以官治商，以商制夷”的政策，令粤商十三行居间经办对外贸易的各项事宜。“一口通商”时期（1757—1842），十三行发展达到了巅峰，殷实的行商们掌握着城市的经济命脉，并以雄厚的资本推动了中西文化碰撞，广州港盛况空前。随着洋船纷至沓来，清政府对外商在广州的活动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每月逢“八”数日，西人可在官员的带领下，渡江到河南（今珠江南）海幢寺、花地，“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为满足贸易和联谊的需求，行商以十三行商馆区为核心，在河南、荔枝湾、花地筑园设馆，盛极一时。这种园林被称为行商园林，或行商庭园^[19]。

“粤东巨室”潘、伍两家为园事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以毗邻海幢寺的漱珠涌为中心，西边“龙溪乡”^①为同文行潘振承（潘启官，Pan Khequa，1714—1788）的潘家宅院所在；东边“安海乡”^②为怡和行伍秉鉴（伍浩官，Wu Howqua，1769—1843）的伍家花园。此外，潘氏家族潘仕成（1804—1873）还在西关荔枝湾建有“海上神山，仙

^① 芳村原称“荒村”，因其荒凉得名。后来居民种植花木，至明末清初，已花果遍地，以“芳”取代“荒”，改名芳村，建国后设立芳村区，后于2005年撤销划归荔湾区。出自《广州百科全书》（广州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人旧馆”的海山仙馆。园内湖面绵延宽广，其水直通珠江，气势非凡。行商们不但在经济上崭露头角，更为提升文化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热衷于园林聚首，将园林艺术以本来的形象记录下来，于是出现了外销画的创作热潮。质感细腻、笔法精湛的外销画随着远行商船飘扬出海，使西方对中国式庭园风格的认识更加具象化。行商庭园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场所，推动了中国式庭园风格在西方传播，为清末岭南园林走向成熟与近代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2.3.2 花地私园

适值十三行“花光万点红如火，照见重洋海舶来”的叱咤商海时，花地则呈现出一幅“香风吹遍荔支湾，画舫菱歌四面环”的田园画卷^①。潘振承次子潘有为（1743—1821）于花地建东园，景色朴实自然，不以建筑取胜，这与当时行商庭园的奢华风貌大相径庭。后东园南部的宅院区售予伍秉鉴之子伍崇曜（1810—1863）修葺一新，易名为馥荫园，寓意先辈积累的巨额资产能继续荫泽后人^[20]。但无论是东园还是馥荫园，均有着十分显著的岭南园林艺术特征，二者更多呈现出延续性和共同的地域文化，也激发了致仕的官员和文人在花地寓居的热潮。“粤东三子”张维屏曾在潘氏东园久居，因喜听赏风卷松涛的声音，于花地建听松园，并作诗“五亩烟波三亩屋，留将二亩好栽花”，描述园中池塘水碧，花木扶疏，颇为雅致。张维屏还于此建造了“松心草堂”，并常在堂内读书吟咏，著有《花地集》《松心诗集》等佳作。晚清诗画家邓大林亦在花地建有杏林庄，杏林庄虽小，但幽深明洁，吸引雅士集咏，结成《杏庄题咏》。陈璞（1820—1887）于首次“杏花雅集”赠诗云：“岭南无杏独此有，好事惊异门屡呼”^④。游园和赋文成为理景的动力，空间营造又促进文化生产。仕、商群体的广泛聚集是形塑花地私园的关键因素，也使西关岭南庭园呈现出全新的园林文化韵味。

2.4 河流与滨水游乐

诸多景致优美的园林使水网密布的西关发展成为游乐消遣的城市中心，在珠江江岸凭栏饮食、欣赏粤剧是极雅之事。有的行商家中甚至养有家班。广东名士谢兰生（1769—1831）常到伍园观剧，他在《常惺惺斋日记》中写道：“上席后平湖家乐亦至，奏数曲。月榭风帘，灯光掩映，洵是珠江雅韵^[21]。”饮食与听曲的良性互动，使西关逐渐成为粤剧艺术开展最为密集的地区。而曲水绕堤、浓荫夹岸的花地因独特的花田及园林风光，发展成市民游览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在有“花局”的节庆日，人们相约“游花地”，不仅能观赏到各大名园的洋花粤果联袂绽放，还能参加“水上花市”。船只以板排钉相连成路，还用洋毡铺垫，游人行走时

仿佛在陆地上。船上不单卖花，还提供海鲜饮食、戏班粤曲表演。花地游人如织，活动盛况隆重且热烈。康有为（1858—1927）年少曾于花地的小蓬仙馆读书，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泛舟重游花地河，写下《人日游花地》的诗句：“烟雨并边春最闹，素馨田畔棹方迴。千年花埭花犹盛，前度刘郎今可回”。

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成就了文脉延续的特征。河流作为孕育文化的地理形态，也成为文脉延续的重要载体。自宋代繁荣的“大通港”到清代崛起的“十三行”，花地河历经持续的叠加，伴生出港口贸易、花木生产、园林艺术、滨水游乐4个文化特征。花地河的文化脉络在自然和社会、经济等综合条件下得以明晰，从内在逻辑上支撑了人地关系的有机进化和持续演进。依托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及文化积淀，花地河的意义及影响已远远超出其经济作用。自然与人文荟萃的花地河，以其融汇中西且独特的河流文化内涵成为地域文脉长足发展的见证。

3 花地河碧道地域文脉保护和利用的营建途径

以省域为视角的规划实践，广东已有珠三角绿道网和南粤古驿道的成功经验。珠三角绿道网在推动实现绿色发展上形成了出色范例，南粤古驿道则在文化线路保护和传承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二者为花地河碧道整合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通过“通络”“塑貌”“凝轴”“承脉”“文脉”，注入后的花地河碧道为荔湾区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提供了深厚的底蕴，赋予“串珠成绿”的城市翠环更多具有地域特质的河流文化内涵。

3.1 通络：构建良性水循环

碧道建设首先强调运用水岸协同治理，以“通络”保障水安全，这也是古人开凿六脉渠治水理念的承袭。历史上荔湾区曾多次受水灾侵害，“东、西、北之江水同时盛涨，省垣一带适受其冲，水势涨至丈余……花地、芳村及西关一带地势较低，受灾尤甚”^[22]。长期以来，广州政府通过底泥疏浚、污染源查控等措施开展综合整治，逐步恢复了涌沟的水文联系，重塑了河流对城市的价值。碧道建立之初，荔湾区从花地河流域全局出发，组织实施截污纳管、堤岸提升、清污分流等工程，并通过四闸联合调度，构建良性水循环。“河长制”同步推进，实现全域覆盖，促进部门协同合作，使治水兴水的合力逐步显现。水利设施的合理规划使“落雨大，水浸街”的境况从源头得到有效控制，目前花地河水质已常年稳定保持地表Ⅳ类水，实现沿线堤防全面达标，防洪能力满足200年一遇。

在治理效果的基础上，花地河碧道以风景园林学科与多

① 潘振承原籍福建漳州龙溪县龙溪乡，青年时入粤经商设同文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任十三行总商，其鼎盛时期在广州城南置地，建祠开基，并将建筑坐落一带命名“龙溪乡”，以表不忘故乡。

② 伍氏原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来粤经商，至四世伍秉鉴，成为十三行巨富，故伍家花园一带又称“安海乡”。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年），怡和行伍秉鉴取代同文行潘振承的地位成为行商之首。

③ 出自《羊城竹枝词》[马溪吟香阁主人（清）选辑·广州图书馆典藏书库，1877]。

④ 岭南本无杏，杏林庄园主邓大林继承父业药行，园名本意是以“杏”赞颂主人医德医术，后因友人赠与北方杏树于园内成功栽植开花，更添“杏物”的含义。出自《杏庄题咏》（邓大林·广州艺芳斋，1864）。

学科融合的新思路,进一步关注受损生态过程的修复,并将“近自然”作为恢复河流动态过程的先进理念纳入河道形态及结构的重建和设计,利用自然的韧性解决城市问题。基于此,花地河碧道推行“岸边带生态治理”的海绵城市理念,强调用生态工程的方法改善水质水体,维护景观可持续和生物多样性,使以污染治理为主的水质恢复工程逐步转向针对水体及岸带的近自然修复工程,有效地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同时增强游径空间吸纳和涵养的能力,为碧道建设稳固功能本底。

3.2 塑貌:重现滨水风貌

水岸风光是碧道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成河涌相间,嘉树浓荫的滨水风貌,花地河碧道不乏独具特色的岭南树种,首为树干挺拔、高大繁茂的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莫伯治先生在《岭南庭园概说》一文中曾指出“花木结合具体环境,借以构成具有诗情画意的所谓‘景栽’,而‘最具岭南庭园景栽特色的首推水松^[23]’”。全盛期的伍家花园的主景区万松园遍植水松,潘家宅院内亦有六松园、义松堂等景点。张维屏的听松园有诗云:“水松排列落江村,风起涛生籁自喧。也与山松同一听,此园名唤听松园^[24]。”水松形态清疏挺劲,常用于河网地区,不单树形优美,还可作固堤、护岸和防风之用。第二则是乡土树种,如榕树 *Ficus microcarpa*、木棉 *Bombax ceiba*、白兰 *Michelia × alba*、人面子 *Dracontomelon duperreanum* 等。乡土树种经年生长,郁闭度高,作为碧道植物基底具有优势。尤其是榕属 *Ficus* 植物冠大荫浓,其枝上生根,千丝万缕,连接水陆两域,最能体现岭南滨水特色。被冠以“英雄树”的木棉,也尽显南国风情。清代“岭南三大家”屈大均(1630—1696)曾描绘木棉列植岸边的丽景:“舟自泔河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25]。”第三则是岭南佳果,探水而生,更显本地风光。例如,蒲桃 *Syzygium jambos* 在秋冬前后垂果压枝,以及水翁蒲桃 *Syzygium nervosum* 横斜在水边,夹岸相映的景象均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这些滨水植被不仅包括种植历史长久的传统植物,还有假槟榔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台湾相思 *Acacia confusa* 等独具观赏性的外来引种植物,充分突出岭南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展现四季花开、终年常绿的地域景观风貌。

3.3 凝轴:集纳岸线空间

轴线景观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时空缩影。滨水空间往往沿着穿越城市的河流形成绵长的岸线,岸线空间的“大”系统需要“小”节点见微知著,创造一种递进的序列,一种延伸的关联^[26]。花地河碧道以游憩系统贯通富有特色的节点与城市景观,形成水岸公园带。历史上,西关不仅是粤海关、十三行之所在,也是怀远驿的设立之地。花地河碧道

在线性景观空间中,将游憩节点以“驿站”命名,充分活化利用源于南粤古驿道文化内涵。花地河驿站主要以旱溪形式,采用浅凹绿地构建雨水花园,在减少径流的同时形成一条特色的游览路径;还设置穿梭在林木之中的廊桥,在自然与游憩之间起到良好的衔接作用;并在桥下种植艳山姜 *Alpinia zerumbet*、鸢尾 *Iris tectorum*、美人蕉 *Canna indica* 等野趣横生又低维护的高度耐水湿植物,与乔木结合共同形成湿地生态系统。此外,传统造园要素也渗透于花地河驿站的场地营造。在岭南园林中亭、榭统领景观的手法屡见不鲜,至行商庭园兴起后,又发展出将楼建于池中作为全园活动中心的做法,如海山仙馆中就有高楼塔阁,处之观景可将珠江风帆尽收眼底^[27]。花地河驿站于旱溪之上建有景亭,其掩映于四围绿茵中,统领场地,“隐现无穷之态,招摇不尽之春”^[28]。该亭为歇山顶,翼角起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①,使雨水可以最快的速度下注而远离亭身;景亭的檐口平缓“反宇向阳”,又有多纳日照的好处;通透开敞的建筑不仅提供了欣赏景致、消暑纳凉的主厅堂,其本身也是可供观赏对象。

依水筑园的传统也结合花地河碧道呈现,花地河东岸的“八大名园”之首醉观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址复建,是花地花圃园的重要遗存。碧道建成后,已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在此领略到这座名园遗珠的风采。醉观园中有两处阔大的水池,池岸曲折盘转,上建曲桥,池边又以亭、榭、花木、山石半围绕布置,汲取了行商庭园在空间的构成手法;而园中花木丰盈、叠石奇巧,又呈现出传统园林“占水栽花”、筑石堆山的精粹。值得一提的是,醉观园中还保有盆景园,陈列具有代表性的各式盆景,展示了经营性花圃园最具价值的历史缩影,饱含情思地印证了花地花木贸易的历史^[29]。

3.4 承脉:建立情感认同

日常所熟悉的氛围是集体打造的情感空间,将常见的环境具象化、符号化,可使景观像文字语言一样,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增添空间感染力。这种转化根植于人们往昔的城市印象,因此,碧道建设应关注公众的参与性,以共同缔造的景观空间回应居民的情感记忆,使人文与景象有机统一,彰显理想水生活的气韵。岸边艇仔隐现于水荫之中,以水为镜形成映照之美;高树浓荫下自觉“埋堆”(聚集)的各式座椅,延续“担凳仔,霸头位”的传统生活片段。鲜明的生活印记是地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挖掘空间的象征符号,可构建出具有情感记忆的地方片段。游历于花地河沿线,市民与游客在码头、廊桥、民居、宗祠,甚至大榕树下,逐步建立起对环境氛围和集体情感的认同。建成后的碧道已经成为周边居民的社交空间,其贯通性和可达性使越来越多健康的交互行为得以实现。

着眼全局,花地河碧道作为承续历史的景观空间已逐渐与当代人居需求较好契合,文脉的融入也使得荔湾区受到社会各界游客青睐。2023年11月“花地河”“醉观园”被正式列入《广州市地名保护名录(第二批)》,这也意味着曾

① 翼角向上翘起的造型如同鸟类振翅高飞的羽翼。出自《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中华书局,2017)。

经“大隐隐于市”的花地河，作为历史与现实互映的线性廊道，历经漫长的岁月更迭，依然泽被后人，充满生机。

4 结语

园林营造承载着文脉深层的内涵，是当地传统、历史和其他精神价值的载体。当把视野拓至更为广阔的国土空间时，区域尺度下“水脉”与“文脉”共生共荣的碧道建设代表着国人对人居环境品质的核心追求。本研究以花地河“水脉”特征为线索，回溯历代人文活动沿水系分布的情境与发展源流，并勾勒出唐宋至明清时期花地水系所承载的地方历史意象。这一过程对城市滨水文化底蕴的理解和承续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总结出碧道建设通过构建良性水循环、重现滨水风貌、集纳富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岸线空间以及建立情感认同的4个途径，初步搭建了碧道地域文脉保护和利用之间的桥梁。但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基于空间载体，河流景观特色价值所承载的历史意象能否得到充分理解、转换并再生，以及后续如何量化引入群体感知数据从而为碧道设计优化提供方向等，仍亟待研究。据此针对花地河碧道的后续建设提出3点展望：第一，景观文脉的研究是理解、认知的基础，需要通过更精准化的传播路径使其核心价值有效地走进公众视野；第二，应延续和复兴与滨水公共空间相关的水上文化活动，尤其是“游花地”“水上花市”等的动态人文景观（类似珠江夜游、荔湾湖游船），使其成为振兴水上旅游经济的抓手，重塑滨水文化活力；第三，需关联性考虑碧道各类要素，多方协同建立碧道整体化的价值认识体系和动态化、可持续的管理策略。

水脉承载资源禀赋，文脉承载人文积淀，脉脉相生，美美与共。城市化进程由过去对扩张速度的追求转向如今对发展质量的提升。在高品质国土空间需求的背景下，“万里碧道”战略的提出是广东省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推动水文化景观历代维系的有效途径。新时期碧道的建设将在南粤大地打造碧水清流的生态廊道，从而为复现临水而居的人地关系提供理论参考，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多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胡秀媚, 牛丞禹, 魏冀明, 等. 景观水文视角下河道工程规划设计研究——以广东万里碧道江门段为例 [J]. 南方建筑, 2022 (6) : 25-33.
- [2] 赵玲玲, 夏军, 杨芳, 等. 粤港澳大湾区水生态修复及展望 [J]. 生态学报, 2021 (12) : 5054-5065.
- [3] 马向明, 魏冀明, 胡秀媚, 等.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思路: 广东万里碧道规划建设探讨 [J]. 规划师, 2020 (17) : 26-34.
- [4] 王世福, 刘联璧. 从廊道到全域——绿色城市设计引领下的城乡蓝绿空间网络构建 [J]. 风景园林, 2021 (8) : 45-50.
- [5] 冯舒, 唐正宇, 俞露, 等. 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场景要素与路径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J]. 生态学报, 2022 (20) : 8223-8237.
- [6] 陈建华. 广州山水城市形态演进特征的阐释 [J]. 南方建筑, 2003

(4) : 17-19.

- [7] 冯江, 牧骑. 广州西关老街坊复甦的路径与行动兼论遗产都市主义 [J]. 时代建筑, 2024 (1) : 6-15.
- [8]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哲匠营城: 古代广州城市营建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 [9] 梁廷枏. 南汉书·卷十七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 [10] 刘南威. 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 [11] 黄小娅, 唐晓阳. 从广州原芳村区地名看其语词特征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1) : 22-26.
- [12] 周肇基. 花城广州及芳村花卉业的历史考察 [J]. 中国科技史料, 1995 (3) : 3-15.
- [13] 王存. 元丰九域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4] 广州市芳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芳村文史 (第二辑) [M]. 广州: 广州市芳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9.
- [15] 龚伯洪. 广州古今竹枝词精选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 [16] 广州市芳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芳村文史 (第一辑) [M]. 广州: 广州市芳村区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8.
- [17] 张欣, 彭长歆. 花木生产与园林营造: 清末广州花地的生产性景观及其公共化 [J]. 广东园林, 2024, 46 (1) : 82-88.
- [18] 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19] 莫伯治. 广州行商庭园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 莫伯治文集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
- [20] 冯立燊, 李若兰. 广州花地馥荫园的历史与复原研究 [J]. 建筑史学刊, 2024 (2) : 145-160.
- [21] 谢兰生. 常惺惺斋日记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 [22]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9.
- [23] 莫伯治. 岭南庭园概说 [J]. 建筑史, 2003, 19 (2) : 1-22.
- [24] 张维屏. 张南山全集 (二)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25] 屈大均. 广东新语 [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1.
- [26] 章明, 张洁, 秦曙, 等. 风景的媒介——杨浦滨江雨水花园的四重叙事 [J]. 中国园林, 2021, 37 (7) : 49-54.
- [27] 冯江, 李睿. 潮汐与广州园池 [J]. 建筑史学刊, 2023 (1) : 147-161.
- [28] 计成. 园冶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 [29] 包宇珩. 广州花地醉观园构景意蕴探究 [J]. 广东园林, 2023, 45 (5) : 54-58.

作者简介：

包宇珩/1990年生/女/辽宁沈阳人/硕士/佛山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佛山528000)/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城市景观设计